

中國經學

ZHONGGUO JINGXUE

第十八輯



主編◎彭 林

■紀念沈文倬先生誕辰一百週年

緬懷先父沈文倬先生 ○沈 菴

沈鳳笙文倬先生值得後人敬仰的五大方面 ○陳戍國
“周禮”通釋

——紀念業師沈文倬先生百歲冥誕 ○華 唐

古禮書中之祝與巫 ○葉國良

論上博簡《天子建州》首簡所言禮制 ○賈海生 馬瑜慧

武威漢簡《服傳》“女子子”服義探賸 ○陳 韻

《儀禮》婦人拜儀說 ○許子濱

從《武王踐阼》論周初敬德明德之本 ○林素英

試論《禮記正義》中的注家破經 ○呂友仁

儒家“六經之首”、“群經之首”探微 ○丁 鼎 王元臣

禮樂之復：唐順之經學義理研究 ○鄧國光

讀曹君直《箋經室遺集》 ○嚴壽澂

沈文倬先生的《孝經》研究 ○李 慶

沈文倬先生禮經學管窺 ○彭 林

■青年論壇

《鄉射禮》復原工作紀要（四） ○清華大學《儀禮》復原小組

《儀禮》“賓進東北面辭洗”釋疑 ○郭超穎

《禮書》宋元版本考 ○張 琪

■書訊

《孫詒讓全集》本《周禮正義》點校本簡介 ○邵 燈

《近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簡介 ○邵 炳

後記 ○彭 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經濟學

—第十八輯—

主編◎彭林

逆市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經學. 第 18 輯 / 彭林主編. —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95-8894-7

I. ①中… II. ①彭… III. ①經學—研究—中國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30111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 530007)

開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 15 字數: 25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 ~ 1 500 冊 定價: 88.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中心集刊

本刊入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年來源集刊』

編委會 (按姓氏筆劃排列)

池田秀三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林慶彰	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夏長樸	臺灣大學中文系
陳鴻森	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野間文史	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彭 林	清華大學歷史系
葉國良	臺灣大學中文系
單周堯	香港能仁書院
喬秀岩	北京大學歷史系
虞萬里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趙伯雄	南開大學古籍所
鄧國光	澳門大學中文系

■主 編：彭 林

目 錄

■紀念沈文倬先生誕辰一百週年

緬懷先父沈文倬先生	1	沈 旻
沈鳳笙文倬先生值得後人敬仰的五大方面	7	陳戍國
“周禮”通釋 ——紀念業師沈文倬先生百歲冥誕	11	華 唐
古禮書中之祝與巫	35	葉國良
論上博簡《天子建州》首簡所言禮制	47	賈海生 馬瑜慧
武威漢簡《服傳》“女子子”服義探賸	53	陳 韻
《儀禮》婦人拜儀說	69	許子濱
從《武王踐阼》論周初敬德明德之本	93	林素英
試論《禮記正義》中的注家破經	111	呂友仁
儒家“六經之首”、“群經之首”探微	123	丁 鼎 王元臣
禮樂之復：唐順之經學義理研究	131	鄧國光
讀曹君直《箋經室遺集》	149	嚴壽澂
沈文倬先生的《孝經》研究	165	李 慶
沈文倬先生禮經學管窺	175	彭 林

■青年論壇

《鄉射禮》復原工作紀要(四)	191	清華大學《儀禮》 復原小組
《儀禮》“賓進東北面辭洗”釋疑	203	郭超穎
《禮書》宋元版本考	215	張 琪

■書訊

《孫詒讓全集》本《周禮正義》點校本簡介	92	邵 燈
《近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簡介	202	邵 炳
編後記	230	彭 林

Contents

A Memorial to My Father, Professor SHEN Wenzhuo	SHEN Shi
The Sublime Life of Professor SHEN Wenzhuo	CHEN Shuguo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Rites of Zhou	HUA T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orcery Clergies(<i>Zhu</i> and <i>Wu</i>) in Ancient Ritual Classics	YEH Kuoliang
A Study on Etiquette on the First Slip of <i>Tianzi Jianzhou</i> 天子建州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Text	JIA Haisheng & MA Yuhui
The Meaning of Daughter's Mourning Apparel in the <i>Wuwei Inscribed Slips of the Han Period</i>	CHEN Yu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Bows Performed by Women as Recorded in <i>Yili</i> 儀禮	HSU Tzupin
<i>Wuwang Jianzuo</i> 武王踐阼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Virtue at The Beginning of Zhou Dynasty	LIN Suying
On ZHENG Xuan's Correction of Classics in <i>Liji Zhengyi</i> 禮記正義	LYU Youren
On The First Can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ING Ding & WANG Yuanchen
On TANG Shunzhi's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ANG Kwokkwong
On CAO Yuanzhong's <i>Jianjingshi Yiji</i> 箋經室遺集	YAN Shoucheng
On Professor SHEN Wenzhuo's Study of <i>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i>	LI Qing
On Professor SHEN Wenzhuo's Study of <i>Yili</i> 儀禮	PENG Lin
Restoration of <i>Yili</i> 儀禮 : Working Record IV	LIU et al.
On "the Guest advances for the northeast and declines the master's washing " in <i>Yili</i> 儀禮	GUO Chaoying
On the Edition of <i>Lishu</i> 禮書 Print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ZHANG Qi

緬懷先父沈文倬先生※

沈 菴

爲了紀念先父沈文倬先生誕生一百週年，我在其農曆生日（五月十四日）寫了一條小橫幅：“深考宗周禮樂文明”。這平平淡淡的八個字，或可概括薊閣公，他作爲經學家、禮學家的主要學術成就。“深考”者，表明他做經學學問，不浮光掠影、淺嘗輒止；表明他論述禮經，不泛泛而談、人云亦云；表明他潛心學術，不急功好利、沽名釣譽；表明他治理深奧的禮學，不畏艱難，爲深探其底蘊而考索不已。至於父親怎樣深入考索宗周禮樂文明，當今不少禮學學者都知道一些，而我也曾專門撰文敘述過，^①這裏就不再舊文重說了。

我參加這次會議，遂明白其意義非同一般：第一，以紀念沈文倬先生的百歲誕辰爲名義，即所謂“借紀念的機會”；第二，也是更實在的，乃應主辦方及其召集人之專業工作目的和召集禮學討論的需要。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開辦了“中國禮學文化論壇”，這是一件幸事，故特向嶽麓書院表示祝賀。如果還有一層紀念先父的意思的話，我倒有點兒忐忑不安了；因爲父親倘若在世，一定會謝絕召開紀念會的。記得十年前，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爲他開九十歲祝壽會，他向所長堅拒，到開幕式舉行，他便避壽了。而這次研討會，既稱紀念，那麼在大會上，最起碼的禮儀似當必需；然而，在小型座談會上，弟子和再傳弟子、甚至幾位知名學者，都對父親遺像行了跪拜大禮，我覺得過意不去。父親生前，從來沒有受過弟子們這樣的大禮（初入學拜師也無專門儀式）；他當然不會希望人們在他辭世以後，對他“頂禮膜拜”。若依我淺見，特別是就弟子而言，重要的是不忘師恩、由衷地崇敬恩師；至於行禮，鞠躬可也，不必跪拜。我没能擋住弟子和其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等單位召開“中國禮學文化論壇暨紀念沈文倬先生誕辰 100 週年學術研討會”，安排我作發言。此發言既是對先父的緬懷，亦可謂關於禮學討論的一些感言；本文就是這個非理論性、不系統的即興發言的修改稿。

① 沈菴：《周文鬱鬱其質彬彬：記父親沈文倬教授對宗周禮樂文明的探索》，見《薊閣文存》附錄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他與會者行跪拜禮儀,更無力阻擋會議以紀念為名義,感到自己有違於先父的品性了。

父親確實是虛懷若谷的人,甚至可以說是秉性非常謙抑。他始終認為:對於深邃的禮學蘊含和浩瀚的傳統文化背景,他的研究所得不足道哉,他所做的尚嫌不夠(他自號“荊闇”,或許正出於其謙抑的秉性以及對傳統文化和經學—禮學的總體認識);他從來沒有以成就突出的經學家、禮學家自居。父親是一位謙謙君子;謙謙君子者,實在是難能而可貴的。他在思想上、道德上、品行上、操守上,都達到了謙謙君子的境界。且從父親對其業師曹元弼太先生的感念這一點來說:他誠摯地敬師若父,對業師知恩、感恩,終生不變;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而對業師總是推崇備至,成名之後也不會想到自己在某一點上是否已超越了業師或其他先賢;他經常會講起老師當年怎麼樣教導的、怎麼樣為他解惑祛難、怎麼樣給他指點門徑。父親絕不會把老師的觀點、研究成果或對他個人的教授內容——哪怕是一點一滴——占為己有;這關係到道德、品行上的一個基本素質問題。他說“攘人之善,其善是老師的、是他人的、是古人的,那就不能在有意無意間、由改頭換面而占為己有”。我以為,着意、着力於攘人之善者,即為剽竊!我們看看當今學術界、教育界,可惡的、亦可悲的是常有剽竊他人之觀點、成果、教授內容的事件發生,而且手法多樣,層出不窮。

再反過來說,父親又是怎樣教人的?他為人十分誠懇厚道,對於教學工作、對於培育學術新人,總是滿腔熱情。他教得那麼積極認真(對某些弟子,甚至天天授課好幾小時),毫不保守,甘願傾其所有;並時而採用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方式,從學術門徑上開啓學生治學的方向、傳授治學的方法。不只是對待親炙弟子這樣,對其他詢問者、求教者俱都如此,真乃做到:知而告人,告而以實,仁信也。例如浙江大學的郭在貽教授是著名的訓詁學家,經常與父親討論訓詁學等學科領域的許多問題,父親往往也都有真知灼見,彼此一問一答,相互切磋,兩人忘年之交誼不薄。郭先生敬重父親,謙虛地稱他為“半個導師”——“不是導師的導師”;而父親對郭先生則以摯友待之。又如嶽麓書院的陳戍國教授素來勤奮好學,博士生學業結束、回湖南工作後,依然頻頻修書、向父親問學,師生倆長期鴻雁往來,書面探討禮制等方面的有關問題。我真想把這些來往信件編入書刊發表,對禮學工作者或有些許參考價值;但遺憾的是未能如願。並且,父親對待所有的求教者,不管對方之學術水準是高是低,都一樣的態度謙遜,從不以施教者的姿態出現。總之,上面說明的對恩師、對學生等的態度和表現,均顯示了父親的君子風範。

彭林先生曾說:“靠沈先生一人之功,捍衛了二十世紀禮學的榮譽。”父親假如親耳聽到,一定會說,這過譽了,他人單力薄,沒有那麼大作用。然而我們如今來回顧,他

在十分困苦的環境裏，長期堅持被學界所拋棄、被社會所鄙視的經學—禮學之艱難研究，的確是一個客觀事實；且不說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僅就其艱苦卓絕地忘我奮鬥而言，也的確使我們頗為感動。我曾撰文敘述父親在“文革”期間撰作《武威出土〈禮〉漢簡考辨》等著作的種種情況，^①這裏就不再複述了。不畏艱難、悉心治學、矢志不渝，是父親作為純真學者之君子風範的最令人欽佩的一個方面。

父親有句詩曰“一生似不羨銀魚”，則真實地反映他終生不慕富貴、始終與名利絕緣的高尚人品；對此，他周圍的人無不贊歎再三。大家都知道，父親從來不申請課題經費、不申報任何獎項、也難得外出開會；這似乎有違常例。但他認為：真正想做好學問，特別是理論研究，這些都不是必要條件，都不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前提；“研究成果是否長久立得住，不是靠得獎、靠宣傳，而是要由學科今後發展來檢驗。”這樣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於諸如突破、開拓、超越、大師、國寶等字眼，靠自吹自擂、抑或讓友人相幫吹擂，縱然名利雙收，但倘若研究成果不過硬，那也只能贏得一時的鬧猛罷了。聽一位朋友說起，曾有一個機構願意撥出一筆巨款，請父親出馬主持一個項目，可是他不為所動、謝絕了。他覺得“個人搞經學—禮學研究，不必非有經費不可”；他曾對我說過：“你搞理論物理研究也可不要經費，因為無需置辦實驗器具。”所以，父親的看法、做法，常常不為常人所理解。淡泊名利、鄙薄富貴，也是父親之君子風範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實，正因為他淡泊名利、鄙薄富貴，才靜得下心來，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從事這很難出得優異成果的禮學研究。最近，我跟朋友們說：先父的君子風範和高尚品德，希望得到後輩學者的理解和發揚；當然，我更應勉力而為。

父親說過，經學研究要“戒腐”，即“力避腐氣”，而經學家易犯沾染腐氣的毛病；這個深切體會是曹元弼太先生對父親說的，父親又對其弟子告誡過。經學研究，由於歷史原因和學科本身的特點，往往固守師法、家法，對經文作箋注、對注文作疏解，通常有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規矩，從而作繭自縛、固步自封，無形中就阻礙了經學的發展。所以，陳腐之氣、迂腐之氣要不得！此外，把許多別的概念、別的事情都跟“禮”掛起鉤來，我也以為未必妥當、過於輕率了；這或可作為“腐”的相反變型表現，顯得有點兒“濫”。再者，這個“腐”在當今看來，或許還有腐敗之腐的意思。各種學術研究中的禮學研究，更要防止學術腐敗的侵襲。研究禮儀、崇尚仁義道德、宣揚仁義禮智信和忠孝廉耻勇的學者，怎麼能跟學術腐敗有所關聯呢？我覺得父親治經治禮，沒有沾染上腐氣，他高潔（清高、廉潔），又甚有創新精神，並不一味地泥古（當然亦非毫無根據地疑

^① 沈菴：《父親撰作〈武威出土〈禮〉漢簡考辨〉的前前後後》，《中國經學》第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古)。譬如說,他推崇鄭學,但並不佞鄭;他曾指出《儀禮》鄭注裏的問題。父親敢於提出違背千年沿襲的陳見、定論的新觀點,而這些新觀點是經過反覆細緻論證的;他善於解決千年聚訟的老問題,得出有可靠證據、比較科學的合適結論;他不盲從名師大家,對歷代經學大師、對當代名人權威的學說,往往都能作出十分審慎、相當中肯、一分爲二的評價;這樣的例子在他的著作裏是比比皆是的。有創意、有新的科學論斷,是父親工作的一個很鮮明的特色。

禮學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是倍受冷落的,有時甚至被棄如敝屣。父親從40年代前期起,師從曹元弼太先生治三禮之學;1947-1949有兩年多時間在南京國立編譯館參與經籍整理工作,當時年富力强,又有曹先生的指點,工作效率極高,而且在從事經書校點整理的同時對三禮的理解也很有進境;1949年後,沒有隨編譯館去臺灣;翌年即轉入上海市文管會、繼而進上海圖書館做編目工作。父親由於熟悉古書,寫文章又快捷,在上圖數年除負責編纂《中國叢書綜錄》外,經常受館長之托,寫了大量已刊書和未刊書的提要、簡評以及其他內部報告之類的書面材料,還曾寫過《辭海》裏關於圖書的全部條目的初始稿,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爲人作嫁”,負責編纂《叢書綜錄》也如此。但父親毫不介意,他把文獻資料工作作爲其三禮研究的輔弼和深入探討禮義過程的奠基。可是,在上圖的本職工作日以繼夜,天天早出晚歸,常常加班加點,在不多的業餘時間裏還得先完成館長所委派的寫作任務,因此用於治禮的業餘時間就少得可憐了。缺乏治禮時間,或許是父親決定離開上海的家、調往杭州工作的苦衷吧。然而,在上圖的繁忙工作有一個好處:使得父親有機會博覽群書(包括善本書、未刊書),博覽了方能會通;他對禮學的諸多過人見解或許就源之於他的會通。所以,父親要求他的弟子也做到博覽而會通;但境遇變了,興許比較優越的條件反而不能讓年輕學者樂於並輕易地做到這一點,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似乎是當今社會環境所使然。因爲及至70年代以後,禮學在社會上的待遇有了明顯的轉機。而近十多年來,禮學有些像是“顯學”的味道了:在學界似乎以研治禮學爲榮,不以其爲難,反而覺得治禮在學術研究中是一種上選;領導機構對禮學研究的經費投入相當可觀,甚至將投入經費的多少作爲支持力度的主要標志;禮學研究中心、經學研究中心、“儒藏”、“禮藏”、以經學和禮學命名的論壇或講堂等等,此起彼長,一片生氣盎然。這看起來是好事。惜乎父親去了另一個世界,但在辭世前幾年,他已察覺到這個勢頭,既感到高興,又有些擔憂。他認爲,“禮學是一門深奧、深邃、深沉的學問,不宜大張旗鼓地搞,也不可能打速決戰”,不花幾十年功夫恐難深入領會其精義、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不能讓這門“絕學”真的絕了,但也不必過於顯揚、不能以聲勢求速成。鑒此,我覺得父親的看法

比較客觀，也相當辯證。他不希望人們對禮學的態度從一個極端突變為相反的極端。

父親一再強調：要繼承和發揚的是傳統文化的精華；禮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目標，在於瞭解宗周禮樂文明的真諦、認清“禮”的本質意義。至於展示今存典禮篇章中禮儀儀注的具體形式、搜索和復原亡佚典禮以及曲禮的本來面貌，雖然甚為不易，但還只是深探禮學底蘊的手段和途徑；不過，弄明白進退周旋、名物度數，並掌握基本的推致之法，對於精通《儀禮》今本和復原佚禮，當然是必需的，也可謂禮經之基礎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討論禮制的演變，自然工程浩大；但研究先秦禮制，終究是本源性工作，理當付予極深的功夫，也唯有對本源研究得深透了，才能對其後世的演變把握得較為準確。並且，對於禮制歷代發展的通史考查，亟需結合以對涉及面廣泛的禮制本身之認真而深入的探索，還應該立足於斷代史研究的逐步完善；父親對此有深刻的見解。

父親畢竟是新中國、新時代的人，他關於經學—禮學的思想觀念是比較新的。我也應當對他的一系列觀念認真思考、好好體會。我發現現在有些文章或書裏引到父親的文章或講話，大多引述和評論都比較適當；但也有未把他主要的、精湛的、獨到的見解予以引述，倒是把他偶爾提及的、不重要的、甚至因斷章取義而致的含含糊糊的片言隻語算作他的思想觀念來加以走樣的宣傳，則似乎甚不適當。父親的不少新觀念和獨到見解（構成爲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裏暫且不一一列舉，而僅僅提及一個例子。那便是他在論文中指明“禮是推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即謂‘政之興也’”；從殷商、西周至秦漢以後，禮是被奴隸主階級以至封建主階級用來爲其政治統治服務的。目前，禮已變成一個熱門概念，好像禮也成爲當今建設和諧社會所依托的重要憑藉了，甚至大眾也常常言必稱禮，但禮是什麼却解釋不清。其實，禮的概念從原來的意義到現代的引申，必須有個變革過程；是否可以引申、怎樣引申，應當深思。“宗周禮樂文明是華夏幾千年文明史之淵源”，然而建設現代文明與考索宗周禮樂文明畢竟有別，現代文明與宗周禮樂文明畢竟不能同日而語、相提並論；關於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一些文章予以闡述，對此確可進行深入討論。再者，我覺得父親雖然研究古禮，但他不是一位沉迷於故紙堆裏、不能接受新思想的老學究、“老經師”；他的治禮方式很新穎、很客觀、很實事求是，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對其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另外，父親雖然思想較新，但他不會貿然地“延拓”出一個模糊不清的或牽強的所謂“新概念”領域，也不會隨隨便便地標新立異；開拓也好、標新也好，都不可使所得之結果、結論似是而非。確實，他的各項理論研究都很謹慎、很嚴密；他爲人誠實，做學問也不馬虎，對弄虛作假的伎倆更是深惡痛絕。他曾對某弟子說，撰作並發表論禮的論文、專著，不要以爲反正諳練禮學的人不多就可以粗製濫造，而必須對自己的論文、專著嚴格把關，戒腐的

同時還得戒躁。他希望弟子們和其他年輕學者都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搞難度較高的禮學研究，更要腳踏實地、專心致志、實事求是地工作；“如果把心思用到別的不該用或不值得用的地方去，借用別的名義、憑藉別的依傍，最終都未必有用”。

現在我們來紀念先父沈文倬先生，我覺得先父就像一面鏡子，為我們後輩如何為人、如何為學，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借鑒，假如我是禮學專業人員，那就仿佛照亮了我長遠的治學道路。這次會議，嶽麓書院開辦了“中國禮學文化論壇”，那麼，我就將先父的某些思想觀念奉獻於論壇之上，並附加了我的一些出於粗淺體會的感言。感言中的不恰當、不適宜之處，懇請諸位同仁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沈施，同濟大學物理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

沈鳳笙文倬先生值得後人敬仰的五大方面※

陳戍國

躬逢 2016 年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聯合主辦的禮學論壇暨紀念沈鳳笙文倬先生百年誕辰的會議，作為忝列門牆者，我應該向先生在天之靈獻上我的禱祝之詞，表明心迹才是。

我以為沈先生光輝燦爛的一生，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值得我輩努力學習。

第一，熱愛中華、熱愛故土的家國情懷。

沈菴兄《禮學宗師的鄉情和詩意》一文說：“父親對家鄉的感情十分深厚，覺得家鄉的詩禮氣氛濃郁可人，而這氣氛由來已久。”先生留戀故園的山水和故園的歷史人物。菴兄說：“父親熱愛家鄉，自然就熱愛家鄉的分湖……父親留存的詩篇中諸如《蘆墟關圖》三首，《過三白蕩》、《秋夜要陳翁泛分湖》……《戊寅雜詩》十首、《壬年正月紀事絕句》二十首等，都是記敘在蘆墟以及周圍村鎮的生活、活動情況和一些特殊事件。”晚年詩詞中有云：“旅食何能不久分，鄉思重疊水邊文。尋詩遂眷西湖月，懷友還摹白蕩雲。”“旅夢常依月下蘆，分湖未必遜西湖。自為明聖能吟客，猶似蘆溪舊釣徒。”先生熱愛家鄉的山水，也就必然仇視外來的侵略者。《壬年正月紀事絕句》二十首實錄了 1942 年上元節之後日寇掃蕩蘇嘉湖地區鎮上及其四周民衆橫遭殘酷燒殺的慘狀，表達了對日寇侵略暴行的無比憤怒以及因家鄉和祖國遭到蹂躪、人民遭到殺戮而產生的無比傷痛之情。^①

《壬年正月紀事絕句》二十首中有一首說：“泪眼相看慘不舒，傳言鄉學化為墟。青衿何罪生埋盡，四十三人在一渠。”另一首詩題《滕縣縣長周同挽詩》（1943 年作）：“敵騎踏千邑，守官作降奴。如公盡高節，一死赴強湖。氣絕危城破，魂歸夜月孤。所

※本文原為作者於 2016 年 6 月 25-26 日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召開的“中國禮學文化論壇暨紀念沈鳳笙文倬先生百年誕辰會議”上的講話。

① 沈菴：《禮學宗師的鄉情和詩意》，《中國經學》第 7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67-171 頁。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期諸將帥，奮起衛新都。”^①先生這些詩表達對侵略者的憎恨，對受難同胞的同情，對奮起抗戰的官民的勉勵，對“作降奴”與“盡高節”者的不同態度，都是正確的。

第二，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對學術事業的赤誠。

鳳笙先生本來是可以不必投身於學術事業的。沈施兄《禮學宗師的鄉情和詩意》一文說：“祖父因伯父（沈龍笙先生）在外從政，有意讓父親接受家業，日後打理商務，故在父親十三歲那年送他到嘉善某錢莊當學徒；可是過了半年，父親就逃回家中要求繼續讀書。祖父見其立志學業，頗感欣慰，便同意其要求拜師求學。”

鳳笙先生正式行過拜師禮儀的第一位老師是著名詩人、南社早期社員沈昌直先生（字穎若），向他主要學詩古文辭，有時也學經史典籍。穎若先生對學生們說：“經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鳳笙先生牢記這句話，終生不忘，由是棄商從學，毅然投身於學術事業。施兄寫道：“父親在沈昌直先生等學者的啓發和影響下，認識到經學—禮學是民族古文化的主體、文化傳統的根本，不應任其落寞甚至滅絕，因此立志終生治經治禮。”從1940年24歲起，向前清翰林院編修、湖北存古學堂經學總教曹叔彥元弼先生行拜師禮，從此開始學禮學。施兄寫道：“父親有幸成為曹先生的關門弟子，得其精髓並發揚光大。”“曹先生培養了一位有頑強毅力、執着地繼志偉業、繼‘絕’存‘亡’的弟子，他的教育是成功的。”沈先生又曾向姚廷杰先生學陸王之學，向金天翮先生學治歷史。終於以經學—禮學為專業，為治經學—禮學並把經學—禮學事業推向前進不懈奮鬥，貢獻了畢業力量。

沈先生並不拘限於經學，並不拘限於禮學。他在古代史學、古代文獻學、古代文學、古代哲學以及考古學諸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的治學事業，主要成就在經學—禮學。他所治之經不限於某一經。他的經學成就多在《易》、《詩》、《春秋》、《書》以及《四書》，但最主要的當然是禮學。

第三，為人處事。

這個方面怎麼樣，自己的說法不算數，最好由別人、由群眾做評價。當然，公平的領導也該能夠做出恰當的評論。

曾經當過浙江大學古籍所領導的龔延明所長親自撰寫《寂寞一心續絕學，享譽永世推宗師》一文，對一代禮學宗師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肯定和贊譽：“沈先生為學精深如此，使我欽敬；先生還是一個學問博大的高人，又使我高山仰止。……先生為學志趣崇高，以振興絕學為己任，而為人却十分低調……他從不和我談他的不平凡經歷，從不顯

^① 沈文倬：《詩詞賦三十首》，浙江大學古籍所編《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慶祝沈文倬先生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98-599頁。

擺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也不向我提生活上的要求。一次評工資,所裏十幾個人,只有一個指標……考慮到沈師母沒有工作,沈先生家生活比較清苦,而沈先生學術貢獻最大,于是就上報把這唯一的指標給沈先生。事後,沈先生並沒有高興的意思,還對我說:所裏年輕教師多,他們的困難大,應先考慮他們。沈先生是十分真誠的……這就是老一輩優秀知識分子的立身處世……中國高校體制決定了教師……必須爭取課題和研究成果評獎……先生却超然物外,不申請課題經費,不參加評獎,淡泊名利,是一個視學術為生命,沒有雜念,心無旁騖的真正學界精英。”^①

平慧善先生也是在浙大古籍所當過領導的教授,他說:“在我三年多的任職中,清楚地記得沈公從來是勤勤懇懇工作,孜孜矻矻治學,沒有向所裏提出過任何個人要求……工資待遇也只是講師級的。對於自己的待遇,不僅當時沈公沒有一句一辭的異議,終其一生,他也從未為自己的名利地位、工作環境、研究條件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或申請。只知付出,不計回報,大概就是沈公為人處世的準則。……自甘清貧是沈公給大家留下的普遍印象。沈公出身大家,年輕時家境富裕,他的自甘清貧是經歷繁華後的徹悟,是他轉向潛心治學的表現。”^②

第四,生活樸素,淡泊名利,為人低調。

讀者從上文第三條,已可看出鳳笙先生對個人物質生活並不在意。對個人名利也並不計較。他從不張揚自己。譬如“今世治禮經之第一人”這個崇高的名譽,他根本不以為意。鄙人已有好幾篇文章提到:先生從來不在自己的學生面前說到這個榮耀的稱號。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鄙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近三十年前,先生到學生寢室來看望的事。鄙人自愧弗如!

第五,鳳笙先生第一流的禮學成就,第一流的治學精神,永遠值得學習!

沈先生把《禮經》與甘肅武威《禮》簡結合起來加以研究的時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遭到大災難的年代。平慧善所長敘述沈先生那一段歲月的生活和工作情形,大致如下:“他的生活極其簡單,吃食堂飯,住的是兩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房間面臨大路,門對公廁,他安之若素,默默工作,從沒有聽到他對車聲喧鬧、臭氣陣陣的埋怨,在那裏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特別是十年浩劫期間,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都遭摧殘,白天勞動或挨批鬥,有一次挨了打,回房間後,他一言不發,洗去鼻血,拿起書卷,仍然悠游在禮學領域,昏燈暝寫,孜孜以求,十年如一日,撰寫的文章竟倍于曩昔。他的主要著作《薊閣述禮》和《〈禮〉漢簡異文釋》等,大部分都是在這十年中發軔或完成的。無論環境多麼

① 龔延明:《寂寞一心續絕學,享譽永世推宗師》,《中國經學》第7輯,第166頁。

② 平慧善:《往事歷歷思沈公》,《中國經學》第7輯,第158-159頁。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惡劣，身受多少磨難挫折，都絲毫不能動搖他‘治三禮，繼絕學’的初衷心志……在治學道路上孤獨寂寞，前途渺茫，但卻矢志不移，不求人知，這是多麼頑強堅韌的治學精神啊！”

鳳笙先生在“文革”中遭到侮辱、挨打的事，不光是平慧善所長言及，還有施兄、黃金貴君各自在文章中說到。且看黃金貴君是如何說的：“更糟糕的是‘文革’開始後，沈先生也被掃進‘牛棚’，我作為教師戰鬥隊的一個小頭目，完全不顧‘同鄉’情，與其他頭目一起組織了教師對他的批鬥會，沒有一條材料，但將他批得一文不值，會上有人還上去狠狠擊打了他的頭。但會後，他仍然在斗室書堆中挑燈夜戰（那時都在單身宿舍）。現在知道那時他正在寫《武威出土〈禮〉漢簡考辨四種》。而此事一直成了我內疚的心病。”^①那年月，先生就因為讀禮書，研究禮學，講什麼傳統文化，就難免遭受批鬥，難免挨打。那是不要禮義，不要人情的年月。為了表現所謂革命立場，為了表現對黨的忠誠，總有人自覺地表演激烈的行為。這黃君終究還要算有點良心，終究還會寫文章表示“內疚”。我們感謝黃君坦率地承認他自己當年乃是革命派的一個小頭目，他是親眼看見他的戰友當年打沈先生的。

然而就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先生忍辱負重，白天接受折磨，夜晚耽於治禮，終於基本完成了《武威出土〈禮〉漢簡考辨》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的撰作，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贏得了國學大師顧頡剛等大學者的充分肯定，成就了不朽的聲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提出的問題，“四庫”學者就經學提出的種種問題，武威《禮》漢簡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大多已獲得鳳笙先生精闢的回答。譬如禮典的實行與三禮的成書年代、兩漢經學的師法家法問題，關於三禮的解說與三禮的傳承、關於《禮經釋例》與《禮經校釋》的成就，鳳笙先生都自有心得，自有精當的評論。我們同意並欣賞“學術為天下公器”的觀點，但我們還是要說：鳳笙先生以天下第一流的治經學、治禮學的精神，創造了第一流的經學—禮學的成就！

沈鳳笙先生的成就，是學術界共同的財富。作為鳳笙先生的學生，我們應該承擔起不可推卸的責任：先是把鳳笙先生的著述學習好、繼承好，而後是解說好。如有可能，還要努力做到發展好。禮學不應該停滯不前，而應該根據時代與人民的需要，對相關的古代禮儀加以革新。鄙見如此，如何作為，那就要看未來的情況而定了。

作者簡介：

陳戍國，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代表論著有《中國禮制史》等。

^① 黃金貴：《大智若愚好義師》，《中國經學》第7輯，第161頁。